

河湟文化是青海文化的主体文化

——关于青海文化定位的思考和建设

□ 鲍义志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6月2日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期新的文化使命。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同时他还重点阐述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即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青海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我认为首先应该找准青海文化在中华多元一体文化中的方位,也就是说,应该明确青海的文化定位。

习总书记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

青海地处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交接处,人文地理位置极其特殊,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在这里相互作用影响,世界几大宗教文化与本土文化相映相融,各民族民俗文化竞相争辉,可以说是丰富多彩,异彩纷呈。青海文化一直以来呈现的是独特的多元地域文化,文化底蕴深厚,人文内涵丰富。

研究表明,河流与人类文明密切相关,孕育了人类文明,如“两河文明”“恒河文明”等。炎黄子孙包括全世界的华人,把黄河流域视作中华民族的摇篮,把黄河视为母亲河。黄河文明是华夏文明不可替代的主体。它是中华文明最具代表性、最具影响力的主体文明,也是世界文明史上流传最久、最具特殊性的轴心文明。

2019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郑州召开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将河湟文化置于黄河文化四大分支文化(另外三大分支文化是河洛文化、关东文化、齐鲁文化)之首,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了大众的视野,成为了人们的共识。这在党的历史上是首次,是我们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的重大指导和根本遵循,也是我们创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础和依据。中国共产党青海省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报告也指出:“挖掘河湟文化,昆仑文化厚重积淀和丰富内涵,提升影响力。推进青海文明探源、优秀民族文化等领域研究,提炼展示新时代中华优秀文化的青海精神标识,打造‘山宗水源’‘大美青海’文化符号。”

所以,河湟文化是青海的主体文化,这是毋庸置疑的,我认为青海文化定位可以表述为:以河湟文化为主体(或者为代表)的多元文化。这正是青海的文化自信。

一是历史悠久。河湟地区的人类活动史可以上溯到距今四五万年前,从那时起的漫长岁月里,河湟地区出现了卡约文化、宗日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等众多古人类文化遗迹,发掘出柳湾遗址、喇家遗址等大型聚落遗址。秦代以前,这里是古羌人繁衍生息的家园。秦汉以后,中央王朝的势力逐步深入这个地区,中原文明与边疆文明、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在这里交汇,创造出灿烂辉煌的文明形态。深厚的历史积淀,奠定了河湟文化长盛不衰的根基。河湟文化没有因历史上朝代更迭而断源流,而是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吸纳外来文化要素,不断焕发出新的气象。青海是黄河的源头和上游地区,而河湟文化也是黄河文化和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

二是异彩纷呈。河湟地区是黄河流域最主要的多元文化聚居地。这里是汉族、藏族、回族、土族、撒拉族等多个民族共有的家园,是汉传佛教、藏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众多宗教传播的基地,这种多元地域文化、多元民族文化、多元宗教文化相互碰撞、交流、交融的现象沿袭了数百年,赋予了河湟文化独有的特点和魅力。汉族、藏族、回族、土族、撒拉族、蒙古族等各个不同民族在各自的文化生存发展中,发挥着独具特色的生存智慧,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与生存实践中,渐渐融合成了以东部的河湟地区为地域中心,以其所衍生的生存生活状态为精神内涵的河湟文化。河湟文化是历史先民在一定的物质文明基础上的精神文明化的结晶,有着独特的文化类型。河湟地区是国内少见的多元多样文化繁荣发展的沃土。如:以柳湾原始公共墓地、喇家遗址、马场垣遗址为代表的古遗址文化,以藏族文化、回族文化、土族文化、撒拉族文化为代表的民族文化,以瞿昙寺、佑宁寺、塔尔寺、隆务寺、夏琼寺、东关清真寺、街子清真寺为代表的宗教文化,以花儿会、赛马会、纳顿节、六月歌会为代表的民俗民间节庆文化,以土族婚礼、撒拉族婚礼、藏族鼓舞、热贡艺术、“花儿”、皮影为代表的非遗文化,还有以民族刺绣、服饰、剪纸、

雕刻、奇石工艺等为代表的工艺美术文化,可谓色彩斑斓、气象万千。

三是团结和谐具有和平性。与国内大部分地区各少数民族聚居而居的情况不同,河湟地区各民族大多以杂居的方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汉、藏、回、土、撒拉以及东乡、保安等各民族比邻而居,不同民族群众共同生活在同一个村庄里的情况比比皆是。在地域上相互依存,在经济上联系互补,在生活上互相帮助,在文化上交流互融是河湟地区民族关系的主要特点。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民族迁徙从未中止过,历史上许多民族在河湟地区你来我往,吐谷浑西迁,撒拉东来,吐蕃人、蒙古人游牧征战,还有唐蕃古道、丝绸之路的繁盛兴衰,这些民族在河湟流域交换血脉,进行了基因重组,逐渐形成了对国家一体的认识,产生了对中华民族的向心力。河湟地区产生过喜饶嘉措大师、十世班禅大师这样伟大的爱国者,他们的精神值得传承和大力弘扬。而河湟文化就是通过历史上不同民族多元文化的传播共享,相互交流,融合创新而逐步形成。体现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历史存在。表现在文化上,河湟地区形成了许多各民族共有的文化形态。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河湟地区各民族共同创造了“花儿”这种特有的艺术形式。“花儿”是民歌,是河湟文化的一朵奇葩,是各民族共同浇灌的艺术瑰宝,像这样一种艺术方式被多个民族共同珍爱,共同传唱数百年的情况,在世界艺术之林中绝无仅有。更重要的是这种形式的文化交流在各民族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动局面,是历史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体现。

四是文化遗产丰富。河湟地区是青海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最为富集的地区,拥有大量各级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热贡艺术、土族盘绣、贵南藏绣、河湟皮影等艺术形式已经发展为规模可观的非遗产业,土族纳顿节被称为世界上最长的狂欢节,众多非遗项目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的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遗名录,河湟文化具备了非常广阔的发展前景。

河湟地区又是人们探索黄河源流以及不断迁徙往返最频繁的地区,李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慨叹,始终引发着人们的无尽联想。此外,河湟地区作为早期黄河流域人类活动的主要区域,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出现了较为发达的原始文明。以柳湾出土文物这一项为例,已被列入上世纪我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当地发掘出的马厂类型、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辛店文化、齐家文化等1730余座墓葬,跨越了新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出土文物37925余件。其中出土的彩陶器文物有近两万件,其数量之多、制作技术之先进,堪称远古文化中的翘楚,被誉为中国的“彩陶王国”和“彩陶故乡”。著名的古人类学家、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在《中国史前文化的传播与融合》一书中指出:“彩陶发达的中心无疑是在黄河流域,西起青海,东迄河南,青海史前文化与中原文化一脉相通之处,其为中国文化的孕育地,当无疑也。”翦伯赞、顾颉刚、戴传贤等也都有类似的论述。因可以说,是河湟文化铸就了黄河流域文明的文化内核,推进了黄河流域文化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进程。

五是连续性和创新性。文化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会促使文化的形成及内涵不断更新变化,表现出它的创新性。从古至今,河湟文化都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如古代昆仑神话中绚丽多彩的彩陶艺术、壁画艺术、岩画艺术、彩绘艺术等,无不凸显着河湟文化的活力。作为河湟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形态“花儿”,呈现出鲜活的生命力,作为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这一文化形态,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每年的花儿会期间,依然有成千上万的群众涌入花儿会场如痴如醉。青海省文化厅主办的“西北五省区花儿演唱会”成功举办20届,成为了青海的一个文化品牌,同时丝路花儿艺术节等节庆活动的成功举办,极大地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青海省的花儿歌手在全国各地演出大赛中屡屡折桂,让人们欣喜不已,以“花儿”为标志的河湟文化真正呈现了文化的创新性和连续性。可以自豪地说,河湟文化以丰富的内涵、鲜活的生命力、丰沛的艺术价值在黄河文化中独树一帜,在青海的文化形态中独占鳌头。近年来,河湟文化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论文、专著迭出,这些成果是大批省内外专家学者潜心研究的成果,体现了河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魅力。河湟文化研究的活跃,也以这一层面证实了河湟文化作为青海文化主体的一种在学术上的共

识。河湟文化完全符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明突出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概括。河湟文化覆盖了青海80%以上的人口,涵盖了青海的汉族、藏族、回族、土族、撒拉族、蒙古族六大世居民族。将河湟文化定位为青海的主体文化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文化指示精神的具体举措,是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际需要,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青海可持续发展的的重要途径,也是青海省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的文化支撑。

青海省在十多年前也曾提出:青海是以昆仑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但这一定位并不能被专家学者所认同。而在实际上,人们始终认为远古羌人所创造的昆仑神话,昆仑文化只是河湟文化的一种源头文化,但由于缺乏实际的载体,没有连续性,所以不能成为青海的主体文化。但这并不影响我们提出和打造昆仑文化国家公园。

关于河湟文化方面,目前应该着力推进的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推进建立国家级河湟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在已经获批的省级土族(互助)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和撒拉族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的基础上,将河湟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纳入国家战略,进行顶层设计,形成合力。适时提出河湟文化国家公园的概念,将河湟文化国家公园的打造看作贯彻习总书记关于实现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举措,看作创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际行动,同时也是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青海样板。二是高度重视河湟文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设立中华文明标识区。以喇家遗址为例,位于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南部的喇家遗址是我国目前唯一一处人类史前综合灾难遗址,记录了4000多年前人类经历的重大灾难,这里还是世界上第一碗面条的发现之地,科学和人文价值十分深厚,目前已经建成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还有位于乐都区的柳湾彩陶博物馆馆藏十分丰富,数以万计精美的彩陶展示着史前这一地域文明所达到的高度。还有临津关古渡、禹王峡、大禹故里园都是无可替代的中华文明标识点,需要重点保护和打造。三是大力弘扬和打造大禹文化。青海喇家遗址一带是治水英雄大禹的故里,“导河积石”于史有据。大禹治水的精神正是中华民族战胜困难、一往无前精神的体现。弘扬大禹精神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自信心。目前已经打造成功的民和禹王峡等景区已经显现出了这种潜力。四是积极恢复黄河祭祀活动。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举办黄河祭祀活动可以实现中华民族将黄河作为民族发源地,文化归宗心理的表达,可以激发人们对母亲河的敬仰感恩之情,有助于凝聚全世界炎黄子孙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信心。这个祭坛设在黄河源头的青海省境内,是最为适宜的。五是进一步升华人文旅游深度融合。十余年前,在我的提议下,民和南部三川地区创建“喇家遗址、大禹故里、土族风情、黄河风光”四位一体的文化旅游项目,先后被列入省“十三五”和“十四五”规划纲要。为此,省上和海东市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喇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式建成开放,禹王峡景区初具规模,临津关景区接官亭已顺利完工,土族纳顿节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得到有力的扶持,传承有序。民和三川地区地处黄河北岸,是甘肃省进入青海的门户,是“古丝绸之路”和“唐蕃古道”进入青海的第一站。“四位一体”打造民和南部文化和旅游项目,对于总体提升青海省的文化内涵,全面贯彻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对于创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保持脱贫攻坚成果,加快乡村振兴步伐,实现可持续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确立河湟文化为青海的主体文化,是对历史文化的传承,是对客观实际的科学概括,更是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对文化、对黄河文化、对青海工作的一系列指示精神的有效抓手和切实举措。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青海各族人民相濡以沫,守望相助,携手走过了艰难险阻,携手走向光明和未来。河湟文化一次次抖落历史的尘埃,创建着不朽的灿烂和辉煌,这始终让青海各族儿女深感自豪,不断推进着我们的文化自信。我深信,在新的历史时期,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河湟文化一定会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增添新的无以伦比的光彩。

河湟文化拾萃

1918年11月10日,前清民政部员外郎、学者梁济在北京积水潭投水自尽。他在自杀前留下的万言遗书中说,他的死是由于并不能从混乱的民国政局中看到希望,而更让他失望的是作为价值依托的“诗礼纲常”不再是维系人心的基石。梁济的困惑可能是许多晚清士人的共同精神困境,只是他选择了以自己的生命来惊醒国人。这个时候最为引领思想风潮的是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人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其口号如民主、科学,比如打倒孔家店等极具鼓动性。

其实,打倒孔家店并不是要打倒孔子及其学说。在儒学发展的历程上,孔子被不断变换过脸谱,至少有董仲舒的孔子、韩愈的孔子、朱熹的孔子以及康有为的孔子等等。尤其是经过朱熹的改造,使儒学成为禁锢人们思想的主要根据。“打倒孔家店”实际上是打倒儒学中那些消极的、毒害人们心灵、禁锢人们思想的那一部分内容,并非打倒所有儒学。儒学研究名家、北京大学教授于春松认为,近代以来,儒学遭受重大挑战,但也面临新的机遇。儒学的近代进程为我们展现了儒学“一阳来复”的图景。

现代化的运动,在后发国家无一不引发普遍性与本土性的激烈矛盾。在经历了近百年的探索之后,中西文化的冲突依然存在,但中国文化的自信却随着国家能力的增强而日渐恢复。于春松指出,当人们开始反思近代以来对传统的态度,并积极从古老的文明中寻求基于中国本土的现代性和全球化生活中,儒家又回到了我们的生活中。于春松最新出版

的《儒学的近代转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3月)包括“制度与心性:儒家的合内外之道”三部分,以政治与学术双向视角,集中梳理、论述西学东渐下,作为传统中国价值主体的儒学的困境和转型,探究新时代儒学的发展和未来。

作者对近代以来儒学发展中康有为、章太炎、钱穆、张申府、冯友兰等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及其思想主张进行了分析。以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梁漱溟为例,他认为中国近代的问题是过度模仿西方的政治制度。梁漱溟以“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立)”八个字来概括中国社会的特点。即中国人以情理来认识这个世界,以伦理来组织社会;因为理性早期,以伦理代宗教,所以没有团体生活,没有阶级,故而社会成员以职业确定其身份。这样的社会不可能建立起以民主和法制为基础的欧美式的现代国家。有鉴于此,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是民族自救的唯一道路。所以梁漱溟呼吁知识分子要下乡,要发挥传统社会中“士人”的作用,在知识上教育民众,在道德上成为民众的榜样。

作者强调,从秩序的建构的原理来讲,儒家必然要起越来越大的作用。在一个幅员广阔的国家进行社会治理,有统一的价值观是必要的,但在制度设计上,则允许各地有多元化的探索。多元化的地方秩序的建构,就是发挥各地的特点。就此而言,也不一定非要强调儒家的因素,也可以是其他的传统文化资源,但在多样化的探索中,传统的因素不容忽视。如何利用传统的资源进行因地制宜的社会治理,需要深入探索。

儒学的历史与现代使命

——读《儒学的近代转型》

□ 彭忠富



麻仲宝绘画作品欣赏

